尤利乌斯·埃宾豪斯

（Julius Ebbinghaus，1885.11.9～1981.6.16）

J埃宾豪斯生于1885年，在柏林和布雷斯劳长大，青少年时期受到身为学者的父亲的深刻影响。1904年他开始在洛桑、柏林、哈雷、海德堡等地上大学，主修哲学，一度曾成为黑格尔主义的忠实信徒，后受海德堡新康德主义影响，开始转向康德哲学。1909年他在文德尔班门下获得哲学博士学位，1919年在胡塞尔门下获得大学教授资格，随后开始在弗赖堡、罗斯托克、马堡等大学的哲学系任私人讲师、教授，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曾出任重新开放的马堡大学校长。埃宾豪斯的工作重点是柏拉图、康德、黑格尔研究，关注的重点是历史哲学、社会政治哲学、伦理学等问题。他的思想和著作反映了德国传统知识分子对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德国民族及其命运的反思。这篇自述中有关他本人在爱国主义热情驱使下的两次参战经历，以及他和海德格尔的私人间友好交往，读来都令人感兴趣。

家父赫尔曼·埃宾豪斯(Hermann Ebbinghaus)出身于威斯特伐伦的一个家庭，其成员中绝大多数人都是从事纸张生产或贸易的企业主。他本人则是家庭中第一个从事学术工作的人：当我 1885 年 11 月 9 日出生时，他正在柏林大学担任编外哲学讲师。他早年丧父，母亲是个甚为笃信宗教的妇女。她在这方面给孩子们施加的压力使得家父对一切正统观念产生了一种根深蒂固的反感。不过他仍坚持一种理智的、着眼于道德从善的宗教信仰，而且他对这种宗教信仰给予肯定的决心也感染了我。政治上他属于 19 世纪 70～80 年代著名的民族自由党的左翼。他爱国并且是俾斯麦的崇拜者。国内政治方面他不赞成普鲁士政府那种保守、教权主义的方针。由于对普鲁士国家忽视科学代表而重视军方和行政官员的行为感到恼火，他与好友弗里德里希·保尔森(Friedrich Paulsen)商定，拒绝接受也决不使用授予他的、对老教授来说很普遍的政府枢密顾问的头衔，同样他还拒绝接受授予他的四级红鹰勋章。他既不确认收到了这枚勋章，也不听从他乐于听从的勋章委员会的劝告。

在柏林和布雷斯劳——1894 年 4 月家父应聘到此——读完早期预备学校后，我从三年级起在布雷斯劳的玛格达勒嫩文科中学接受学校教育。其结果是使我深信古典语言和文学的教育价值，此外在初等数学和法语方面也得到良好训练。1904 年复活节我离开了文科中学，企图遵照父亲的榜样去学哲学，但没有得到他的半点支持。第一学期我赶时髦到了洛桑。接着于 8 月和 9 月在格勒诺布尔参加了假期短训班，在这里你可以在学校所学知识的基础上，不仅学说一口流利的法语，而且还可以通过参加既酷爱郊

游又风趣的语音学家保罗·帕西(Paul Passy)讲授的课程学说一口纯正的法语

1904 年 10 月，在没有得到家父完全同意的情况下我到柏林大学读了两个学期，家父认为不太有名气的大学对初学者更合适。在那里我聆听了弗里德里希·保尔森讲授的哲学史、卡尔·施托夫(C.Stumpf)讲授的心理学和逻辑学以及埃米尔·瓦尔堡(E.Warburg)讲授的实验物理学这些主要课程。接着在家父于 1905 年秋受聘的哈雷大学就读了三个学期，以便有机会既聆听他讲授的主课心理学又可以听一堂长达四个小时的精彩的哲学史讲座。在研讨课和练习课中我继续学习实验物理学。此外我还听无机化学和有机化学这两门主课。

在此期间我产生了一个愿望，即通过在一位某流派代表人物那里的学习来了解当时德国流行的某个主要哲学流派。我渴望到弗赖堡去。在我看来在那儿任教的海因里希·李凯尔特的《自然科学概念形成的界限》以及《知识的对象》这两本书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独立论述人的知识的基本问题的特色。然而家父看清了李凯尔特内向反思的空洞无物，劝我到海德堡去而不要去弗赖堡。他不无理由地预测，博览哲学史比李凯尔特无创造性的专事概念分析的形式主义对我的哲学学习更有裨益，而在海德堡工作的威廉·文德尔班的著作则是哲学史的见证。

在此期间我不再是哲学讲座的一名纯粹中立的听众了。从最初开始我学习的主导思想就是查清在现有的所有这些哲学中究竟哪些是正确的。或者说，哲学家探索的那种认识一定能被找到吗？我高兴地拜读了叔本华的《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然而更多地是把它作为一种引人入胜的想像力的产物而非认识的产物来读。我试图借助保尔森在弗罗曼经典系列丛书中发表的关于康德的专

著了解康德,然而我既没有弄清《纯粹理性批判》中提出问题的动机,也对此不感兴趣。

在这种情况下,当我在哈雷读第四学期时,我聆听了当时担任哲学编外讲师的弗里茨·迈迪库斯(Fritz Medicus)关于费希特的一个讲座,它之所以吸引我是因为报告人本人异乎寻常的献身精神。从内容上说它使我第一次产生了一种兴奋和激动的企图,即按照某些无可置疑的最高原则构筑一个哲学体系。文德尔班的前奏曲中有句格言 理解康德就意味着超越康德 人们可以把决心重新研究费希特 1794 年的知识学以及 1797 年的那两篇知识学引论视为使进入海德堡研究班圈子的行为合法化。

正是这个圈子使我马上面临一种新的诱惑,它诱使我在我认为应当走的道路上再向前迈进一步,如果哲学在整个科学领域里能再次成为一种普遍承认的角色的话。引诱者是文德尔班的博士生中的一位年长者。文德尔班在每个学期都邀请哲学研究班成员参加一两次晚会,我就是在一个晚会上遇到他的。我同他谈到过我的费希特主义。这位新相识就是奥托·克洛斯(Otto Closs)。

此人在柏林读书期间成为一名具有独特方式的黑格尔信徒。当时黑格尔的哲学传统在柏林大学尚未完全泯灭。以该哲学传统的追随者闻名的名誉教授阿道夫·拉松(Adolf Lasson),一个外行,用妙趣横生的地道的柏林方言为那位施瓦本人的事业进行宣传。此外还有历史学家德尔布吕克 (Delbrück),从他 1924 年出版的《世界史讲演录》中可以看到他信奉黑格尔历史观的详细表白(见该书第一卷,序言第 9 页及以后几页),但是这种信奉表白更多地具有声明独立于兰克学派(Schule Rankes)的特征,而非具有作为对该著作基础的研究有用的原则的特征。那几年对黑格尔感兴趣的还有威廉·狄尔泰(Wilhelm Dilthey),当然以其他的方式。此人根据柏

林国家图书馆收藏的黑格尔青年时代手稿汇编于 1906 年在普鲁士科学院论文集中发表了《黑格尔青年时代纪事》。同时他的学生赫尔曼·诺尔(Herman Nohl)也在为黑格尔手稿的出版而忙碌。手稿于 1907 年出版。

然而对奥托·克洛斯而言，除了狄尔泰当时的学生圈子里具有仿佛黑格尔在场的那种气氛外，由于他同弗里德里希·布龙施泰特(Friedrich Brunstäd)于 1905～1906 年在柏林结成的友谊,还使他得到关于黑格尔的较为明确的提示。弗·布龙施泰特当时正准备他关于《黑格尔历史理论》的博士论文。在 1909 年出版的博士论文节选中，除了狄尔泰以外，他还提到他应当特别感谢的导师是拉松和德尔布吕克。在此期间他已于 1907 年请雷克拉姆出版社再版了黑格尔的《历史哲学讲演录》，并写有一篇包罗万象的序言。该书出版那年的 7 月，即我在海德堡的第一学期期末，这本由奥托·克洛斯亲笔题写了座右铭“我主即精神”的书赠给了我。赠书人似乎想用这种充满激情的题词责成受赠者为他所称颂的主效劳：即向由黑格尔揭示的世界精神效劳。

这时虽然我本人决不愿意无条件地放弃我的费希特式的原则，但这种新的友谊也促使我去深入地研究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这本书吸引着我。它激励着我进一步研究 1807 年这本书出版之前已发表的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本人的著作。研究的结果就是我的博士论文，它经拓展和修改后于 1910 年在莱比锡由菲特-卡门出版社出版，题目是《相对与绝对的唯心主义——对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发展之历史的和系统的研究》。

然而不管是提交给学院并以这种形式付印的博士论文还是为出版而拓展的文稿，都不能称作是什么历史的研究。其中惟一的历史研究就是摘自《纯粹理性批判》两个版本的引文目录，在这些

引文中康德表达了我们的一切表象在其潜意识中都由‘我思考’这种表象伴随着。不幸的是,我不像康德把‘我思考’理解为意识,这种意识能把感官意识到的所有杂多(知觉)在‘我意识到’的那种意识(统觉)以及我本人的意识中结为一体。我认为可以而且必须把那种自我意识视为一切潜意识的源泉,甚至是我们的表象的一切潜在的多样性的源泉。

这表明我对唯心主义的要求太过分。但正是我的导师试图对康德的范畴论进行的修改使我坚持这种由我的费希特情结产生的唯心主义的绝对性,这一点却没有显露出来。文德尔班在为祝贺C. 西格瓦尔特(Christoph Sigwart)七十大寿所出的论文集中发表了一篇题为《论范畴体系》的文章,文章的开头写道:‘自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以来,综合的概念构成了一切理论哲学乃至一切哲学的最终原则。我们把综合理解为构成一切意识的基本特征从而也构成内在经验的基本事实的那种特殊的‘多样性的统一’’(《论文集》第 43 页)。相应地,文德尔班认为:‘之所以能发现范畴体系的原则,是因为人们发掘了包含在多样性的综合统一本质中并成为详细解释其功能的前提的那些可能性。’(参见《论文集》第 47 页)按照文德尔班的解释,在多样性综合统一的本质中所包含的可能性应当根据对表象内容的多种可能的组合的“内在经验”而逐渐发展。但是他认为内在经验“首先表明综合是以相关功能与构成其对象的表象内容之间的对立为前提的。”(同上)然而恰恰是这一点,即不依赖受“我思考”制约的在感性直观中提供的杂多的综合,就根本不会有知性诸概念的对象,也不会有(外在或内在的)经验,这正是超越 1770 年博士论文立场的一大发现,它为康德的先验唯心主义及其对教条主义形而上学的否决打开了大门。(参见康德 1772 年 2 月 21 日给马尔库斯·赫尔茨的信)

很清楚，文德尔班通过尝试从内在经验推导出范畴便排除了同康德批判主义的一切可能的联系。他以此标榜自己是那种“心理学至上论”的代表之一,而非别人标榜的是心理学至上论的反对者。他本人认为自己是那种反对者，这标志着当时哲学在涉及其自身的提问立场时已经处于更为混乱的状态。

这种混乱状态也导致我论述相对与绝对唯心主义的那篇博士论文的题目和论点都不清晰。我当时根本想像不到刚才所说的文德尔班的范畴论与康德的先验唯心主义的根本对立。相反，我以为可以把这两种基本观点都纳入“相对唯心主义”这个概念之中。这种归纳使我犯了个严重的错误。其原因在于我没重视对康德先验唯心主义来说是重要的、作为我们内外在直观的先天形式的时空学说。我忽略了它们，尽管我不是文德尔班的弟子，但还是步了他的后尘。因为尽管文德尔班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坚决地反对康德的先验美学,但是由于他把范畴解释为‘相关思想的形式’或‘包含在杂多的综合统一性本质中的可能性’(《论文集》第 47 页),所以他明显地不重视先验美学。与此相对，康德把范畴解释为“关于一般对象的概念，由于考虑到某种逻辑判断功能，所以对象的直观被视为是确定的”(《纯粹理性批判》第 2 卷第 128 页,参见商务印书馆 1982 年版蓝公武译本第 98 页。——译者注）。略加思考就会发现，这种不涉及先天直观形式可能性的解释是站不住脚的。但是思考也表明，没有直观的内外感官的先天形式，在产生多样性的表象与统觉的先验统一之间的那种客观联系是不可想像的。

我认为，用那两种要素的类似动态的更替过程的理念来代替自我意识与哲学家头脑中的那种多样性东西的主观并立——明显地依靠费希特在他的 1794 年知识学中用来规定自我与代表着表象可能情况的非我关系的那个“交替行为和忍受”——这样就能够

摆脱上述困境，而且只有这样才能摆脱困境。无论如何我认为用这种理念已经排除了哲学家的意识作为联合那两种要素的必要条件,并且也消除了自我意识的统一性与产生多样性的表象之间‘一成不变’的对立。正是用这个‘一成不变’使我发现了康德的‘相对’唯心主义与由费希特的辩证法所开创的‘绝对唯心主义’的界线。这里我不仅忽视了与康德‘先验’唯心主义不同的‘绝对’唯心主义已假设了对相互作用这个范畴的现实使用，而且也忽视了它使我除了毫无创见地接受由我导师首创的统一性(自我意识)与多样性(现有的表象)这两个要素无止境的可能的作用和反作用外不再掌握任何其他东西。

家父未能活到 1909 年春夏,也就是说,没能活到我起草博士论文和准备博士论文答辩的那个时候。前一年，他还和家母一起去参加了 1908 年 9 月在海德堡举行的第三届国际哲学大会。在大会结束的宴会上,流亡到美国哈佛的心理学家胡戈·明斯特贝格(Hugo Münsterberg)致祝辞，他对心理学与哲学的关系的看法与文德尔班和李凯尔特学派的意见一致。他还信奉洛茨(Lotzes)的‘价值哲学”。当他致祝辞讲得兴致正浓并准备表白他对这一哲学的信仰时,他的舌头跟他开了个玩笑:他不去赞赏价值哲学,反倒赞赏起海德堡流行的‘语词哲学’来。这个口误引起的哄堂大笑显然有助于提高家父的声望。他似乎感到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由于他参加这次哲学大会而给我造成的损失给予的补偿。

1908 年底、1909 年初,我阔别家乡一年之后,在家里过圣诞节期间最后一次见到家父。我对那几天中我们在平安夜进行的促膝谈心依然记忆犹新。谈话的主题是文化政策,尤其是家父认为‘太黑暗”的普鲁士文化部的大学政策。实际上,1906 年为反对中央集权而组建的“比洛夫联盟”带给帝国总理的是一个脱离中央集

权、反对社会民主党人的资产阶级多数派。但是在普鲁士州议会中，由于现行的三级选举法，以资产阶级多数派为主、取消中央集权则是不可能的。所以政府对中央集权要求的容忍取决于当时的力量对比，而当时普鲁士政府根本无力改变这种力量对比。

我本人则在我的那些信奉黑格尔哲学的朋友影响下从家父遵循的民族自由主义路线继续向右转。家父对我思想上的这种与黑格尔哲学相关的离经叛道，有时会当着我和其他人的面以父亲般的冷嘲热讽加以评说。但他也随时准备在说理的基础上认真地与我们交换看法。

1909 年 2 月 26 日,在他年满 59 周岁后刚过几周，他突然出人意料地死于肺炎。他患有血栓病，常常谈起他会早亡。我接到电报赶回家，他已经咽气了。

葬礼过后不久,我于 3 月 1 日回到海德堡。1909 年 7 月 14 日我在海德堡通过了博士考试答辩。我的主科哲学的主考官是文德尔班，副科物理是阴极射线的发现者莱纳德（Lenard）。我选择美术史作为第二副科。这一科的主考人是亨利·托德(Henry Thode)，他不仅是位美术史学家,还因支持不受法国印象派影响的‘德国的”伯克林(Böcklin)和托马(Thoma）的绘画艺术以及为里夏德·瓦格纳(Richard Wagner)的事业和拜罗伊特节日汇演作巡回报告而闻名。

后来我总是劝我的那些攻读哲学博士学位的学生选修数学作为除物理学外的第二门副科。我本人也在哈雷和海德堡聆听了数学的主要讲座(微积分、解析几何、代数等),再后来我有时还自学，有时在具有全面数学知识的朋友的帮助下学习这些课程。尤其是从掌握技术的观点来看我觉得对那些哲学博士生来说数学与物理学搭配是最自然的。

当然哲学‘专业’所需要的补充教育根本不能用某几种可以学

会的“副科”来定义。尤其世纪之交在普鲁士人文中学里学的希腊语，作为在希腊哲学领域从事研究工作的惟一基础是不够的。而这正是我人生道路上紧接着要面临的经历。

过 渡 时 期

那时我快到 24 岁了，该是考虑服兵役的时候了。家父于 1870～1871 年在驻守杜塞尔多夫的重骑兵团中服过役，由于他是寡妇的长子，所以才没有被派到前线去。他服役直至获得后备骑兵队少尉军衔。关于加入大学生联谊会一事，他完全让我自己做主，但却认为，对没有加入这种联谊会的大学生来说，服兵役是必不可少的教育要素。

因此我于 1909 年 10 月 1 日报名当了一年梅克伦堡居斯特罗普鲁士野战炮兵团的志愿兵，此外还于 1911 年秋和 1912 年进行了六周的训练，在这期间我获得了预备役军官的资格。当然不知道我这样做是在为现役参加一次世界大战作准备——这次战争除了造成其他灾难外，还使我四年没碰任何哲学。

不过当时的情况还未发展到那样。回到哈雷那个失去了父亲的家以后，我开始起草一篇关于柏拉图的论文，我想用这篇论文去获得在当地哲学系授课的资格。早在 1904 年秋我从格勒诺布尔回来后，就听从家父的建议，对照着希腊原文阅读、摘录并批注了大量由施莱尔马赫翻译的《柏拉图对话》。此外，我还阅读或作为辅导材料查阅了各个不同时代的若干参考书。在此基础上我希望完成一篇论文，帮我消除那个固定在所谓的德国唯心主义时代并对德国唯心主义辩证法入迷的初学者的名声。

然而我把柏拉图哲学作为获取大学授课资格的论文题目，这个

计划本身已经暴露了我实际上在何等程度上仍是个初学者。尽管我力图减轻我想要挑起的重担，因此把柏拉图的哲学分为理论和实践两部分，并受柏拉图第一篇对话以及其他几篇当时仍被有些人视为其青年时代作品的对话的影响,以为可以也应当从研究‘实践哲学”开始，把它当做柏拉图哲学中一个孤立和原动的部分。

但是由于我把对柏拉图所刻画的人关于‘善’进行的各种各样的研究置于了伪系统之下,我因此更多地使柏拉图、随后也使我自己受到了不利的评判。当我把苏格拉底的命题‘人人求善’变成善的定义，即善是人的意愿的必然对象时，我以为可以把致力于这些对象的现实化的对话表述为一个过程的环节，它在论《法则》这本著作中在适度的法哲学实证主义里宣告结束。

1912 年夏，我把这篇论文交给了当时的哈雷哲学专业代理人保罗·门采尔教授，并附带问他是否认为这篇论文适合作为获得在大学授课资格的论文。答案是否定的。同时他向我强调指出，他的同事卡尔·普莱希特尔（Karl Prächter）必定会参加审理我的这篇论文，而且此人的意见非同小可。1909 年普莱希特尔主编出版了最初由弗里德里希·于贝尔韦格（Friedrich Ueberweg）撰写的《哲学史纲要》三卷本中第一卷有关古希腊罗马哲学的修订本。他在他工作的哲学领域里具有无可争议的权威，而我以为我可以通过我的论文中显现的对柏拉图著作的博学，赢得他对我进一步发展柏拉图学说的赞许，我的这个想法恰恰证明我缺少成功地谋求大学授课资格的必要条件。

因此我便把一切希望寄托在这么一种信念上，即通过拓展和加深对柏拉图著作及其相关文献的研究，我的求职一定能获成功。因此我回到了写字台旁，更确切地说是回到了我在大学图书馆阅览室的工作岗位上,以企求借助对柏拉图研究的拓展和深化,给我

自己这艘船一种能驶向预期目标的承载能力。

英　　国

这时候家母的一个旅居英国的弟弟来访，他女儿于 1912 年夏来到哈雷，为的是在当地的外科医院治愈她的膝关节结核病。我舅舅邀请我到伦敦他的家里去过冬。由于这能使我摆脱自 1905 年至 1906 年和 1906 年至 1907 年这两个冬季以来我所卷入的哈雷教授家庭的社交场合，我十分乐意接受这次邀请。我对社交场合会给我在与哲学系的关系方面造成负担已有所体会。在英国，我置身于一个全新的世界。

我整个星期都有充足的时间在大英博物馆的阅览室里追寻对我的柏拉图论文进行解围性修改的幻影。令我惊讶的是，在这个著名的图书馆里，我不仅找到了数目齐全的英文版的柏拉图文献著作，而且还找到了在哈雷已为我熟知的德文版的柏拉图文献著作。其中有保存完好但未装订成册的文献，甚至还有未裁开的。因此我不懈地阅读着，并利用所读的内容拓展、压缩或重新编排我的论文——但我仍然没有认识到错误在于我自己提出的任务而不在于它的解决。

在英国逗留期间的一个插曲反映了我的这种状况。为了访问牛津，经一位亲戚的介绍我被推荐给那所大学的一位指导老师，这位老师是个比我还年轻的男士，他像接待家里暂住的客人那样友好地接待了我，临走时他给我写了一封给牛津大学图书馆管理部门的介绍信。我把这封信交给了阅览室的管理员并向他说明，我想查阅那部著名的收录了柏拉图著作的牛津大学图书馆法典。当被问到为何要查阅法典时，我向他解释说，我正在写一本关于柏拉

图的书。但是究竟为什么写书需要旧日的手稿呢？确实有足够的出版物，从中可以看到各种流传下来的东西。那么究竟为什么要看旧手稿呢？我除了结结巴巴地说那份手稿的确是一件了不起的古迹之外，再无言以对。结果他摇了摇头，给我指了指他面前的那张桌子，让工作人员把手稿取来放在我的面前。在那里我才第一次看到，与我们的托伊布纳(Teubner)文字相比,希腊字母以及由这些字母构成的缩写词和未经缩写的词看起来是个什么样子。面对放在我面前的这份文物，我竟然提不出任何确切的问题，只能对它赞叹不已。对此，一丝忧伤之情向我袭来。然而我还远没有从业余爱好者的睡梦中醒来。

1913年4月，我结束了在英国的逗留，为的是把在伦敦收集到的材料写成关于柏拉图的新论文稿。我首先完成了新论文的打字稿并于8月份把它与一份获取在哈雷哲学系授课资格的申请书一并呈上。然后我前往艾尔兰根，在我朋友布龙斯泰德家中为预期将要举行的大学授课资格论文答辩做准备。1913年至1914年的冬季学期开始时我回到哈雷，在一个供食宿的旅店里等待着系里的决定。11月21日系主任书面通知我，系里决定不考虑我的请求。

这次拒绝对我的打击也许从一个事实中可见一斑，即我几乎记不起以后的几个星期我都干了些什么。清楚的是现在不能再考虑把柏拉图作为获取在大学授课资格的论文了。但是在我开始写新论文前,我要得到一位哲学教授席位所有者的承诺,如果我提交给他令他满意的论文，他会向哲学系推荐我获得授课的资格。在开始建立新的联系时要作些非同寻常的供认——我的一篇关于柏拉图的论文在哈雷遭拒绝,这对建立新关系没有好处,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

然而通过文德尔班的友好推荐这次尝试成功了。虽然海德堡

哲学系当时编外哲学讲师如此饱和，以至于李凯尔特这样说道：“我尊敬的老师文德尔班似乎把私人讲师获取授课资格视为人的力量对它无能为力的一种自然现象”。但是正是这位我曾求助过的文德尔班成功地通过他以前的学生李凯尔特为我在弗赖堡大学获取授课资格展现了希望。发往哈雷了解我在那儿失败的原因的信函似乎得到了对我不无友善的答复。甚至由李凯尔特授予大学授课资格和由他考核（正如他明确地告诉我的那样）的弗赖堡的编外讲师们也表示同意。他们中有个里夏德·克罗纳（Richard Kroner），他和我一样都来自布雷斯劳的马格达莱纳，是比我高两届的中学同学。因此我能在 1914 年 1 月满怀着生活希望前往弗赖堡。

弗赖堡的春天

在我的记忆里，从那时开始紧接着在弗赖堡的半年时间直到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政治风云的临近，这段时光不仅仅是摆脱了为获得在哈雷大学授课资格而拼命努力给我带来的压力。使我感到迄今为止从未有过的喜悦的主要是我离开了与母亲和兄弟姐妹共同生活的家而独立生活。我在弗赖堡城北位于山坡和莱茵河平原之间绿地的一幢新楼房里租了一套小房间。我用几件自己的家具或者说是家母分给我的家具布置了这套房间，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用书架装饰了房间。我把我自己的藏书以及家父的几千卷科学藏书摆放在书架上。

与李凯尔特发生更密切联系的基础是自然而然地形成的，我曾请求他允许我参加他的夏季学期研讨班练习课。把我同里夏德·克罗纳家联系在一起的除了属于同一个学派之外还有滑冰，他夫人在少女时代时，我在布雷斯劳南区公园的溜冰场上教过她溜冰。克

罗纳忠实于李凯尔特的客体理论，而在我的心目中黑格尔继续占据优势，他和我之间的这种对立在不断重复的讨论中都表达出来。我认为，当时在克罗纳易受影响的心灵里已经撒上了第一粒种子，正是这粒种子发展成为黑格尔主义，他后来信奉的正是黑格尔主义，而我则刚刚从中摆脱出来。我甚至同约纳斯·科恩(Jonas Cohn)副教授(他还兼心理学课)和格奥尔格·梅利斯(Georg Mehlis)编外讲师都毫无困难地建立了一种将来友好合作所必需的关系。

我游山玩水，这种神仙般的居士生活向我提出的紧迫任务就是恢复我那稍有波动的内心平衡。自从上舞蹈课以及随着青春期到来不可避免地会遇到少女调情，我已习惯于用诗意般的倾诉去控制我感情上的风暴。现在阻碍我恢复被扰乱了的平衡的东西，部分是对拒绝我任课申请的客观理由缺乏了解，部分是由于传给我的消息说，家父对我的哲学发展的否定评价在拒绝我的申请时也起了作用。

家父可能认为我选择的哲学方向不过是一种由于过分的研究而产生的、由外界影响而激起的荒诞，这种看法已经是老生常谈了，实际上也确实如此。但是我感觉仿佛家父被从坟墓中引用以指责我，哲学系介入了一种它既无权利又无能力做出判断的关系中。我把对此的愤怒都发泄在一首由 12 个八行诗节组成的哀歌之中了，哀歌的题材就是自少年以来家父对我的智力和道德的形成所给予的无法比拟的影响。由此我心中产生了一种下意识的同他的亲近感，即使是今天我的某个梦中还时而出现这样的情景。家父活生生地站在我面前。我感到如释重负：他根本没有死，我满腔热情地把那些书拿给他看，我在书中记下了他不在时我是如何管理他留下的家产的，并满怀希望地等待着他的夸赞。

无论如何，有了这些经历之后我毫不仓促地处理了新的授课

资格论文的题目问题，这是可以理解的。我脑海中所考虑的这篇论文所必须论述的难题，就是我写博士论文以来一直困扰着我的关于我们的表象意识与存在着的东西的存在之间的关系问题。显然这个题目受当时关于哲学与心理学关系连续不断的争论的限制。但同时制约着它的还有我缺乏对以下这个问题的必要性的认识,即应通过哪些特征去考虑诸如此类的存在物的概念 可以认为它是与一个由概念规定的那个某物完全不同的东西吗？除了可以用概念加以规定以外，这个某物还应当由什么样的特性来加以规定呢？而用这样一种同义语反复的规定会得到什么呢？另一方面，与之相对立的问题是：在其可能的多样性中的那个存在物(das Seiende)究竟是否能够被共同规定为可能的、由概念加以规定的诸对象的统一？人们越是对这个问题追根究底，就好像越是站不住脚。

所以我宁愿暂且把我的时间部分地用于我在哈雷获得的、像往常一样浅薄的数学知识的练习和巩固上，即每天做微积分教科书上相关的习题。我用另外半天时间阅读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的修订本,并期待着‘ 从精神王国的高脚杯里 ’给我‘ 冒出 ’一篇新的获取大学授课资格论文的问题思路来（ Problemstellung）。 然而 1914年 7 月从欧洲内阁的高脚杯里冒出来的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真令人不可置信。

世　界　大　战

甚至是我当时也受德国在世界上负有特殊使命的思想的感染，我相信可以用这种思想来支撑我心甘情愿地去履行国家公民应尽的义务。我还没有认识到人类合法局面的开创受一些较小的

势力集团的制约，它们之间的争吵任何时候都需要使用暴力清除的手段才能结束。那种认为在这么一种状态下包含有人类朝着“永久和平”的方向前进的条件的看法有根据吗？

而这恰恰是战争动员时刻人们无心回答的问题。我本人也在第一次动员中应征加入了弗赖堡野战第 78 炮兵团的后备炮兵营，当了副曹长和后备军官，而且马上就面临着给那里大批志愿兵指导士兵手册的任务。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我讲授的第一堂课，同时也有助于控制我的兴趣朝道德原则问题的方向发展。

1914 年 8 月底，我以弗赖堡野战炮兵团机动炮兵 1 营弹药运送小分队队长的身份被派往前线， 12 月被提升为少尉，1915 年春作为初级参谋军官被调到炮兵营营部，不久被任命为副营长；1917 年春我得到一个炮兵连，我带着这个连在代姆河畔舍米那和佩罗讷投入了战斗，直到 1918 年 1 月我被任命为当时被派往意大利的第 117 步兵师参谋部的初级参谋时，才结束了我任弹药运送队长职务的军事生涯。4 月初，该师被调去增援鲁登道夫在法国北部凯麦尔展开的春季进攻战，试图进行徒劳的突破。

迄今为止，我一生中从未忘记 1918 年 11 月 9 日，我 33 岁生日那一天，也是战争结束以及德国革命爆发的那一天。这是深秋一个晴朗的日子，我同副师长一起骑马穿过阿尔贡森林与马斯河之间那座山岭里的树林，向着确定为我们撤退的第一个宿营地的地方进发。当然我们滔滔不绝地谈到革命，谈到威尔逊、皇帝、马克斯·冯·巴登亲王、沙伊德曼和所有与此有关的东西。然而我发觉，这一切丝毫没有触动我的内心深处。重新获得的生活用一种使我感到欣喜的目光注视着我。此后只有一次我觉得晴朗的天空这么蓝蓝地闪闪发亮，那就是 1945 年 3 月 28 日那一天，当美国人的装甲车驶进马堡，我费力地阻止我母亲去搂住这些解放者的脖子的